

【了如指掌·国学馆】

主编 龚鹏程



了如指掌

大师的国学课 2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著



大师的国学课 26：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著.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大师的国学课26. 了如指掌·国学馆)

ISBN 978-7-5392-7302-0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310号

大师的国学课 2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DASHI DE GUOXUEKE 26: 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

作者: 梁启超

出品人: 傅伟中

策划: 周建森

组稿编辑: 万哲

责任编辑: 万哲

特约编辑: 孙明新

装帧设计: 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55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392-7302-0

定价: 3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2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

“了如指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她有一个理想：力图以全球视野、中国眼光、当代立场，在古今中外的智慧宝藏中精选出一套中国公民人生必备的通识文库。鉴于“了如指掌”广泛的读者中必然有那些可以改变中国将来的年轻人，因而中国文化与传统也必然是这套文库的重中之重。于是便有了您手中的这套“大师的国学课”系列丛书。在编辑丛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谨随钱穆先生的要求。他在其大作《国史大纲》中要求他的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史不只可为鉴，亦是一种温醇的爱国情意。“了如指掌”国学馆之“大师的国学课”系列正是一套向钱穆先生致敬的丛书。个中精选都是大师们不故作艰深、不执高头讲义的作品，尤其适合年轻读者阅读。我们期望通过这些作品与广大读者一道，向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致以温情的敬意。

——编者

校订说明

本书原为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等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成书后共分十六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题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一册，现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当时听讲者回忆的对照，应即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以下简称“讲义本”

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计有：（一）《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即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原载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二）《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即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原载1924年6月至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包含第一讲至第十二讲全部内容；自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连载于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经比对，该种即为转载前述“清华学校讲义”本。上述四种，以下简称“报刊本”

1926年7月，上海民志书店刊行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首个单行本，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第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并将报刊本及民志本所用新式标点改为旧式断句，成为此后该书较为通行的版本以下简称“《合集》本”。可能由于成书仓促，这两种单行本均有较多印刷错误。

“清华学校讲义”为本书最初版本，亦可视为民志、《合集》两种单行本的母本。早先发表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部分，在收入民志、《合集》二本时稍有增删，但整体内容变化不大。讲义本、报刊本虽为梁氏未定稿，较之后出单行本，错误反而较少。故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二）第十三讲至第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三）其余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具体凡例如下：

1. 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 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己”、“巳”、“已”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 参考底本所用标点，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底本以“□”表示待补字，“(?)”表示存疑，连续星号(*)表示段落区隔，均予保留。

4. 为存梁氏定本面貌，凡后出单行本对讲义本、报刊本有大段增删处，以及章节划分、章节名有更改处，仍依《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并在校记中说明。但该部分个别字句的增删，则以讲义本、报刊本为主。

5. 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

不作改动。

6. 该书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书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意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外，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有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目录

001 | 校订说明

001 | 第一讲 反动与先驱

011 | 第二讲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019 | 第三讲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025 | 第四讲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043 | 第五讲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057 | 第六讲 清代经学之建设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079 | 第七讲 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

091 | 第八讲 清初史学之建设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103 | 第九讲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张杨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113 | 第十讲 实践实用主义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崑绳 程绵庄 恽皋园 戴子高

145 | 第十一讲 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寅斋 附：其他

155 | 第十二讲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183 | 第十三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小学及音韵学

231 | 第十四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

275 | 第十五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

335 | 第十六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

第一讲 反动与先驱^{〔一〕}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二〕}》。

今年是公历一九二三年。上溯三百年前之一六二三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三〕}。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豫备一部当参考。

* * * *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他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 * * *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他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一〇〇〇至一六〇〇——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四]、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越发厌倦，所以人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素朴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加增，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1]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

[1] 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多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一五二九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忌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弇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惟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挺击”、“移宫”诸大案，^[1]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得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

[1] 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窗户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也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

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五]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

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存。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

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

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卒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年五十六，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国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贵、蜀、桂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1]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2]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1] 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2] 《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莛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年（一六三三）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载〕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辨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豫，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庸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等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智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时候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间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1〕}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

〔1〕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李天经、杨廷钧、郑洪猷、冯应京、王〔木〕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胥臣、熊士旂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牍》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